

# 禁毁满译《西厢记》与金批《西厢》的传播

吴 刚

**内容提要** 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明确禁毁满译《西厢记》。那么,朝廷为何发布禁毁满译《西厢记》的律令?禁毁满译《西厢记》对金批《西厢》的传播有何影响?通过揭示满译《西厢记》与金批《西厢》的关系,可以使我们了解乾隆十八年之后金批《西厢》的刊刻传播情况,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在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的传播面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金批《西厢》没有因满译本《西厢记》的禁毁而受到太大影响,依然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关键词** 金批《西厢》 满汉合璧《西厢记》 禁毁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以下简称“金批《西厢》”)自顺治十三年(1656)成书以后,影响很大。不过,到了乾隆十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朝廷开始禁毁满译《西厢记》。那么,朝廷为何发布禁毁满译《西厢记》的律令?禁毁满译《西厢记》对金批《西厢》的传播有何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

乾隆十八年,朝廷开始禁毁满译《西厢记》。《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〇六三“厚风俗”条载:“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上谕内阁: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禁。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sup>①</sup>

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sup>②</sup>《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sup>③</sup>《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sup>④</sup>等书目所载,乾隆朝之前的满译《西厢记》刊本有两种:一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一是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精译六才子词》只有曲文,没有科白,共四卷。满汉合璧《西厢记》译者序为骈体文,作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一。该刻本有曲文,有科

①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4页。

② 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版。

③ 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北京市民族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白，共四卷。因为是刻本，且有曲文和科白，因此更具有典型性。此外，还有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系清雍正十一年（1733）抄本。此本不同于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除了有前四本之外，还有第五本，属于全本，这是其他满汉合璧《西厢记》刊本所未见到的。

乾隆年间禁毁的满译《西厢记》与金批《西厢》有什么关系呢？具体比较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sup>①</sup>、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sup>②</sup>、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sup>③</sup>与金批《西厢》<sup>④</sup>刻本的各卷题目总名、题目正名，发现有以下三点差异。

其一，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没有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即没有“卷一：序一，曰恸哭古人；序二，留赠后人。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三：会真记。附：会真记考证文章四篇；元稹、白居易等诗二十三篇”的卷目与内容。笔者认为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内容，体现的是金圣叹文艺思想，这三种满汉合璧《西厢记》本子为了突出重点，直接进入正文，因此翻译时删去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内容。

其二，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一至卷四的各章题目与金批《西厢》卷四至卷八的各章题目基本一致。其中，卷一第一章《惊艳》、第二章《借厢》、第三章《酬韵》、第四章《闹斋》；卷二第六章《请宴》、第七章《赖婚》、第八章《琴心》；卷三第九章《前侯》、第十章《闹简》、第十一章《赖简》、第十二章《后侯》；卷四第十三章《酬简》、第十四章《拷艳》、第十五章《哭宴》、第十六章《惊梦》，与金批《西厢》各章题目完全一致。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卷二第五章《寺警》与金批《西厢》第五章《寺警》一致。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二第五章《惊寺》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二第五章《惊寺》一致，但与金批《西厢》第五章《寺警》不一致。此外，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有题目正名，依次是卷一第一章题目正名“老夫人开春院”、第二章题目正名“崔莺莺烧夜香”、第三章题目正名“小红娘传好事”、第四章题目正名“张君瑞闹道场”，卷二第五章题目正名“张君瑞破贼计”、第六章题目正名“莽和尚杀人心”、第七章题目正名“小红娘昼请客”、第八章题目正名“崔莺莺夜听琴”，卷三第九章题目正名“张君瑞寄情诗”、第十章题目正名“小红娘递密约”、第十一章题目正名“崔莺莺乔坐衙”、第十二章题目正名“老夫人问医药”，卷四第十三章题目正名“小红娘成好事”、第十四章题目正名“老夫人问情由”、第十五章题目正名“短长亭斟别泣”、第十六章题目正名“草桥店梦莺莺”。这与金批《西厢》各章题目正名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金批《西厢》第十四章题目正名为“老夫人问由情”，第十五章题目正名为“短长亭斟别酒”。

其三，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没有续四章；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有续四章，续四章各章题名正名依次是“小琴童传捷报”“崔莺莺寄汗衫”“郑伯常乾舍命”“张君瑞庆团圆”，与金批《西厢》续四章的题目基本一致。金批《西厢》续四章题目及题目正名依次是“捷报 小琴童传捷报”“猜寄 崔莺莺寄汗衫”“争艳 郑伯常乾舍命”“团圆 张君瑞庆团圆”。

① 此本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② 此本为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此本四卷一函四册。线装，页面高23.6厘米，宽14.5厘米；版框高16.9厘米，宽12.0厘米。半叶十二行，满汉文间隔各六行，小字双行，行字不等。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口有汉文书名、单黑鱼尾、满文卷次、汉文页码（《满汉合璧西厢记》，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此本有关资料由南京大学孙书磊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④ 本文所引金批《西厢》均据傅晓航校点本，参见傅晓航《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西厢记集解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因此可以说,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来源于金批《西厢》原刻本。

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很重视金批《西厢》。顺治帝对《西厢记》颇有创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录有顺治帝与木陈忞关于《西厢记》的交流情况:“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张生初见双文时语,尤侗以为八股题目,效当时体,戏作一篇,刻入《西堂杂俎》。顺治爱读《西厢》,又识八股文,故击节叹赏如此。此断非汤司铎所能赞成者,惟老和尚或能引皇上由此悟禅。因西厢者本普救寺之西厢,玉成张生姻缘者又即普救寺之和尚。顺治尝云,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盖深有得于西厢待月时也。《北游集》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分,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案,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量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sup>①</sup>从上述可见,顺治帝知道金圣叹其人,认为其“才高而见僻”。由此可知,顺治帝喜读《西厢》,且其所读《西厢》为金圣叹批点《西厢》刊本。

顺治帝重视《西厢记》,也与明末《西厢记》刊本盛行有关。据蒋星煜研究,崇祯年间《西厢记》本子就有十三种,如:崇祯三年(1630)郑国轩校《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五卷,文立堂刊本;崇祯四年(1631)方诸生校、徐渭附解、吴门词隐生(沈自晋)评《北西厢记》二卷,延阁主人山阴李廷谟刊本;崇祯十二年(1639)陈洪绶叙、绘图《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崇祯十三年(1640)项南洲刊《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二卷,西凌天章阁刊本;崇祯年间汤显祖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师俭堂刊本;崇祯年间汤显祖、李贽、徐渭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固陵孔氏汇锦堂刊本;崇祯年间徐渭批点、题识《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五卷<sup>②</sup>。崇祯年间《西厢记》刊本盛行,对清初《西厢记》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见,金批《西厢》的产生并非偶然。据傅晓航研究,金圣叹删改《西厢记》时,依据的底本可能是《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sup>③</sup>。明末《西厢记》刊本的盛行,加之金批《西厢》的影响,促使顺治、康熙重视《西厢记》。

康熙年间,虽有禁毁“小说淫词”的谕旨,但并没有禁毁《西厢记》。《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〇五八载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谕旨,言道:“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应即通行严禁。”(《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7页)在康熙朝下达的谕旨、律令中,没有禁毁《西厢记》。康熙朝不仅没有禁毁《西厢记》,还组织翻译金批《西厢》。昭槿《啸亭续录》写道:“及鼎定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紫肯,人皆争诵焉。”<sup>④</sup>

顺治至康熙年间,虽然朝廷加大了对淫词小说的禁毁,但对于琐语淫词类小说的禁毁和惩处影响较小。朝廷禁毁的重点在于政治倾向明显的作品。据石昌渝考证,清初小说中被朝廷查处论罪者,仅有两部,即《无声戏二集》和《续金瓶梅》。《续金瓶梅》获罪原因主要是它将满族的发祥地描写为

① 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页。

② 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③ 傅晓航《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④ 昭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续录卷一“翻书房”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7页。

人兽同居同食的野蛮之地。应该说，清初对于通俗小说的管理相对宽松<sup>①</sup>。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sup>②</sup>介绍，金批《西厢》有顺治间贯华堂原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刊本有四种：康熙八年（1669）刻本《贯华堂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康熙五十九年（1720）怀永堂刻巾箱本《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康熙年间世德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年间四美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雍正刊本有一种：雍正十一年成裕堂巾箱本《成裕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傅晓航补充康熙刊本一种<sup>③</sup>：康熙八年文苑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可见，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金批《西厢》可以正常刊刻。

那么，乾隆年间为何禁毁满译《西厢记》呢？自乾隆朝开始，满语满文传承出现危机，引发上层忧虑。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高宗弘历在上谕中援引了顺治皇帝的上谕：“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sup>④</sup>于是命宗室子弟专习满书。乾隆皇帝禁毁《西厢记》是担心满洲人沾染汉人不良风气。孙丹书《定例成案合钞》卷二六《杂犯》：“近见满洲演戏，自唱弹琵琶弦子，常效汉人约会，攒出银钱戏耍，今应将此严禁；如不遵禁，仍亲自唱戏，攒出银钱约会，弹琵琶弦子者，系官革职，平人鞭一百。”（《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9页）由此看来，禁毁满译《西厢记》，主要还是想让满洲人保持“满洲旧习”，防止满洲人阅读此书，诱导为恶，形成“习俗之偷”。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成稿时间不迟于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sup>⑤</sup>。抄本“甲戌年抄阅再评”本第一回说，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sup>⑥</sup>，证明至迟甲戌年《红楼梦》已基本成稿，而修订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曹雪芹去世。这个时间段正处于乾隆十八年禁毁《西厢记》的时期。曹雪芹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涉及《西厢记》的情节，自然要把有关禁毁的背景写进去。关纪新曾言：“所谓贾府，是作者以‘假托’方式，对当时包括自家在内的多个满洲世家遭逢过程集中的概括与抽象。”<sup>⑦</sup>他还以大量的实例，论证《红楼梦》描写了满族贵族生活。乾隆皇帝明确禁止满洲人阅读满译《西厢记》，因此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贾宝玉只能偷偷看《西厢记》了。林黛玉、贾宝玉所阅《西厢记》是金批《西厢》，这已是被学界反复证实的问题了。这都说明乾隆年间禁毁满译《西厢记》对满族贵族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 二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虽然颁布了禁毁满译《西厢记》的谕令，但并没有禁毁汉文《西厢记》。到了嘉庆时期，朝廷没有发布新的禁毁条例，只是重申了乾隆皇帝所颁的禁令（《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56页）。地方官府虽也发布了禁毁金批《西厢》的命令，但并不是在乾隆年间，而是道光、同治年间，并且主要在浙江、江苏一带。浙江湖州府罗知府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公布一份《禁毁书目》，共计120种，内有六才子书（《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22页）。道光二十九年（1849）余治编成《得一录》一书，其中卷一一之一载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开列禁毁书目，共计116种，内有六才子书（《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33—136页）。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开了一批查禁书目，共计233种。后又补充34种，其中包括《西厢记》，并

① 石昌渝《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③ 傅晓航《〈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金批西厢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98—99页。

④ 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册，第1559页。

⑤ 石昌渝《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红楼梦》，《国学》2007年第7期。

⑥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⑦ 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附注六才子书。该书目还包括唱本《西厢待月》《红娘寄书》《拷红》等（《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42—149页）。当然，这些《西厢记》唱本还不能说一定是从金批《西厢》而来，也可能与其他《西厢记》版本有关。另外，也禁止演《西厢记》曲目：“且演戏以乐神也，神聪明正直，岂视邪色听淫声也，非直不视不听而已，必致反干神怒……而乃必《跳墙》《庙会》《卖胭脂》，备诸秽态乎……凡有点淫盗诸戏者，仰班头即请更换，尔士民亦宜慎择之。”（《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37页）总之，上述道光、同治年间江浙一带禁毁金批《西厢》，说明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抵触《西厢记》，包括金批《西厢》在内。

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有一些文人视金批《西厢》为洪水猛兽，力主禁毁。吴江人陆文衡，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他在《啬庵随笔》卷五“鉴戒”条称：“金圣叹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等书，眼明手快，读之解颐，微嫌有太褻越处，有无忌惮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14—215页）陆文衡对金圣叹褒贬间杂，情感复杂。华亭人董含，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他在《三冈识略》卷九称：“吴人有金圣叹者，著才子书，杀青列书肆中，凡左、孟、史、汉，下及传奇小说；俱有评语，其言夸诞不经，谐辞俚句，连篇累牍，纵其胸臆，以之评经史，恐未有当也。即以《西厢》一书言之，昔之谈词者曰：‘元词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实甫如花间美人，自是绝调。’其品题不过如是而已。乃圣叹恣一己之私见，本无所解，自谓别出手眼，寻章摘句，琐碎割裂，观其前所列八十余条，谓‘自有天地，即有此妙文，上可追配《风》、《雅》，贯串马、庄’，或证之以禅语，或拟之于制作，忽而吴歌，忽而经典，杂乱不伦。且曰：‘读圣收所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直欲窃为己有，噫，可谓迂而愚矣！其终以笔舌贾祸也，宜哉！乃有脱胎于此，而得盛名获厚利者，实为识者所鄙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15—216页）董含对金批《西厢》极尽诋毁。昆山人周思仁，清初居士。其《欲海回狂集》卷一《法戒录总劝》载：“江南金圣叹者，名喈，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褻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又著《法华百问》，以己见妄测深经，误天下耳目。顺治辛丑（一六六一），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78页）周思仁完全否定了金批《西厢》。昆山人归庄在《诛邪鬼》中对金圣叹公开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曰‘第七才子书’。余见之曰：‘是海淫之书也。’……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sup>①</sup> 归庄也称金批《西厢》为海淫之书。上述文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且主要集中在江苏一带，也就是金圣叹的家乡。根据道光、同治年间江浙一带官府禁毁金批《西厢》及禁毁的一批婚恋题材小说、戏曲的情况，可知江浙一带思想舆论控制较严，一些文人积极维护封建礼教文化传统。其中，金圣叹的家乡禁毁戏曲小说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发声反对金圣叹的文人也较多。

清代金批《西厢》虽然遭到一些文人的诋毁，但影响依然很大，还是有一些文人给予金批《西厢》积极评价。清代批评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sup>②</sup> 廖燕在其《金圣叹先生传》中称金圣叹“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第15页）。也就是说，李渔、廖燕等文人给金圣叹及其批点的《西厢记》给予热情的礼赞。这说明，金圣叹发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通过呼应金批《西厢》，积极发出反抗礼教的声音，表达出民众对婚恋自主的向往与追求。

① 归庄《归庄集》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9—500页。

② 孙中旺编著《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页。

此外，乾隆十八年禁毁的是满译《水浒传》和《西厢记》。一年后，乾隆帝批准胡定的奏章，明令禁止《水浒传》的刊刻和搬演。也就是说不仅禁止了满文《水浒传》，也禁止了汉文《水浒传》，但并没有禁毁汉文《西厢记》。乾隆年间禁毁小说戏曲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即便如此，乾隆年间金批《西厢》还是有多种刊本问世。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乾隆刊本就有九种：乾隆十七年（1752）新德堂刻本《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合趣》，乾隆三十二年（1767）松陵周氏琴香堂刻本《琴香堂绘像第六才子书》，乾隆六十年（1795）尚友堂刻本《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六十年此宜阁刻朱墨套印本《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乾隆间致和堂刻本《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乾隆间刻本《雲林别墅绘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间九如堂刻本《楼外楼订本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间五车楼刻本《第六才子书》，乾隆间楼外楼刻本《楼外楼订正妥注第六才子书》（《元代杂剧全目》，第57—58页）。傅晓航补充乾隆刊本三种：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绣像第六才子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楼外楼藏版《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阊书业堂刻本《绣像第六才子书》（《〈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金批西厢研究》，第98—99页）。以上金批《西厢》乾隆刊本合计十二种，是清代金批《西厢》刊刻的高峰。在乾隆年间这些刊本中，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种：邹圣脉汇注本，书名一般标为《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邓汝宁注本，书名一般标为《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昂《此宜阁增订西厢记》本。这些刊本即便在乾隆朝以后，也屡被翻刻。

乾隆年间之后的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仍有多种金批《西厢》刊本问世。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嘉庆刊本有四种：嘉庆五年（1800）文盛堂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三槐堂刻本《槐荫堂第六才子书》，嘉庆间致和堂刻本《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嘉庆间五云楼刻本《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道光刊本有一种：道光二十九年味兰轩刻巾箱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傅晓航补充道光刊本一种：道光二年（1822）金城西湖街简书斋刻本《西厢记》。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嘉道间刊本有四种：嘉道间文苑堂刻巾箱本《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嘉道间复刻怀永堂本《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嘉道间会贤堂刻本《西厢记》，嘉道间四义堂刻本《西厢记》。傅晓航补充同治刊本一种：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光绪刊本有五种：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石印本《增补笺注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光绪十三年古越全城后裔校刊石印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光绪十五年（1889）润宝斋石印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光绪间广州刻朱墨套印巾箱本《绘像第六才子书》，光绪间石印巾箱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元代杂剧全目》，第58—59页）。傅晓航补充光绪刊本三种：光绪二年（1876）如是山房刻本《增订金批西厢》，光绪十三年上海石印本《绣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光绪三十二年（1906）善成堂刻本《绘图第六才子书》（《〈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金批西厢研究》，第98—99页）。

上述嘉庆至光绪年间金批《西厢》合计有十九种，应该说刊刻还是顺畅的。上述刊刻数量是较为保守的统计，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年代的刻本没有列入统计。总之，乾隆发布谕令禁毁满译《西厢记》之后，金批《西厢》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从上述情况可知，乾隆朝明确禁止《西厢记》满文译本，但并没有禁止汉文《西厢记》；浙江湖州、江苏等地官府虽禁止金批《西厢》，但并没有遍及全国各地。总之，在清廷对戏曲小说的监管逐渐加强并颁布各种条例禁令的情况下，金批《西厢》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因此，清代学者俞樾评价说：“今人只知有金圣叹之《西厢》，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厢》。”<sup>①</sup>清末的著名刻书家暖红室主人刘世珩说：“世只知圣叹外书第六才子，若为古本多不知也。”<sup>②</sup>

① 俞樾《茶香室续钞》，《茶香室丛钞》，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6页。

② 刘世珩《董西厢题识》，董解元著，刘世珩辑刻《董解元西厢记》，广陵书社2020年版，第3a叶。

## 三

乾隆年间虽然禁毁了满译《西厢记》，但在民间依然流传着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第48页）、《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第133、143页）、《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395—396页）所载，有嘉庆元年（1796）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四册，还有未标明年代的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这说明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在民间传播较广。

满汉合璧《西厢记》在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当中也有传播。先看满族民间说唱艺术子弟书。一般认为，至迟在乾隆年间，子弟书已经成为独立的说唱文学和曲艺艺术<sup>①</sup>。子弟书的创制者恰是“名门与巨族”<sup>②</sup>的“八旗子弟”。震均《天咫偶闻》卷七云：“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sup>③</sup>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间，《西厢记》有可能已进入八旗子弟视野。

据《新编子弟书总目》<sup>④</sup>以及《西厢记说唱集》<sup>⑤</sup>载，《西厢记》子弟书有数十种，具体如下：

《西厢记》八回，北京旧钞本；《全西厢》十五本二十八回，聚卷堂钞本、清钞本两种、钞本。另有别题：《全西厢本》道光间京都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

《游寺》三回，清钞本、百本张钞本。另有别题：《张生游寺》四回钞本，《张君瑞游寺》四回钞本，《借厢》钞本。

《红娘寄柬》一回，清钞本两种、别野堂钞本、曲盒钞本。另有别题：《红娘下书》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清钞本，《寄柬》百本张钞本、钞本三种，《红娘寄简》；《下书》二回。

《莺莺降香》二回，清钞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莺莺听琴》一回；《西厢段》四回，京都锦文堂刻本、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另有别题：《全西厢》石印本。

《花谏会》不分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双美奇缘》五回，清同治间盛京程记书坊刻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拷红》八回，清钞本、文翠堂刻本、嘉庆间北京刻本、钞本；《拷红》一回，旧钞本、清钞本；《拷红》二回，百本张钞本、钞本四种；《新拷红》二回；《拷红》五回，百本张钞本、钞本四种。

《长亭饯别》三回，清钞本三种、钞本两种、旧钞本、民初钞本。另有别题：《长亭》，清钞本、民初钞本；《新长亭》三回，清钞本、旧钞本。

《梦榜》二回，作者云崖氏。卷首诗篇末句云：“云崖氏阅览《西厢》传妙笔，演一回望捷的崔氏忆夫郎。”清钞本、民初钞本，钞本两种。另有别题：《莺莺梦榜》。

上述《西厢记》子弟书除《梦榜》有明确作者之外，其他作者不详。另外，《西厢记》八回北京旧钞本、《全西厢》十五本二十八回情节比较齐全，其他都是典型片段情节。因此，这两种本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① 李芳《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68页。现存子弟书最早文本是《庄氏降香》，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刻，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② 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卷，第3398页。

③ 震均《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④ 黄仕忠、李芳、关瑾华《新编子弟书总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83页。

⑤ 傅惜华编《西厢记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285—368页。

上述刊本中，较早刊刻的是道光间（1821—1850）北京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子弟书全本《西厢记》（十五回），篇目为：第一回《张生游寺》；第二回《借厢问斋》；第三回《隔墙吟诗》；第四回《张生闹斋》；第五回《惠明下书》；第六回《请宴赖婚》；第七回《莺莺听琴》；第八回《寄简酬简》；第九回《张生跳墙》；第十回《月下佳期》；第十一回《拷打红娘》；第十二回《长亭饯别》；第十三回《草桥惊梦》；第十四回《郑生求配》；第十五回《衣锦还乡》（《西厢记说唱集》，第287—368页）。这十五回本故事情节比较完整。我们将子弟书全本《西厢记》第一回《张生游寺》与金批《西厢》第一章《惊艳》进行比较，还是能够看到两者的关系。试举两例：

[表1] 金批《西厢》第一章《惊艳》与子弟书全本《西厢记》第一回《张生游寺》比较

金批《西厢》 第一章 惊艳	《西厢记》子弟书全本 第一回 张生游寺
<p>【仙吕·点绛唇】（张生唱）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p> <p>【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棘围呵守暖，铁砚呵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行路之间，早到黄河这边，你看好形势也呵！</p> <p>【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贯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似弩箭离弦。</p>	<p>游艺中原大地宽，脚跟无线任盘旋。蠹鱼不出钻研苦，铁砚磨穿砥砺坚。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十余年。转蓬日近长安远，恰似弩箭乍离弦。</p>
<p>【柳叶儿】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不与人方便，难消遣，怎留连，有几个意马心猿？</p> <p>【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水月观音院。</p>	<p>说罢抽身把门关上，呀好一似门掩梨花深院间。门掩梨花深院间，这张生他呆呆的瞅着只是发怔，锁不住意马共心猿。半晌还过一口气，说道是如何此地遇神仙？分明是南海水月观音现，好教我眼花缭乱口难言。</p>

上述划线处是《西厢记》子弟书与金批《西厢》相近之处。经过细致比较，能够看出《西厢记》子弟书与金批《西厢》存在紧密联系。

此外，还有满族八角鼓：慢岔、平岔、岔曲、牌子曲《西厢记》（《西厢记说唱集》，第105—116页）。

[表2] 满族八角鼓：慢岔、平岔、岔曲、牌子曲《西厢记》刊本

八角鼓：慢岔	小红娘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霓裳续谱》卷七
八角鼓：平岔	星稀月朗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霓裳续谱》卷六
	莺莺沉吟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霓裳续谱》卷七
	老夫人糊涂	
八角鼓：岔曲	张生得病	清钞本《马头调八角鼓杂曲》
八角鼓：牌子曲	游寺	清嘉庆间北京钞本《杂曲二十九种》
	莺莺降香	
	莺莺饯行	清嘉庆间北京刻本《新集时调马头调雅曲二集》
	莺莺长亭饯行	清嘉庆间北京钞本《杂曲二十九种》

上述乾隆六十年刻本就四种，说明乾隆年间满族民间流传《西厢记》很丰富。且看八角鼓慢岔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霓裳续谱》卷七《小红娘》：“小红娘，进绣房，一见了莺莺说是‘不好！’拍了拍巴掌：‘姑娘呵！可有了饥荒！有个人儿本姓张，二十三岁未曾娶妻，守空房。姑娘呵！他叫我和我（引者按：你）商量。’莺莺恼骂红娘：‘这个样的事儿不知道，你可别和我商量。丫头呵！你少要轻狂！’”（《西厢记说唱集》，第105页）还有道光间北京钞本《时兴杂曲》卷四所收的满洲歌《西厢》：“一更鼓儿天，一更鼓儿天，莺莺独坐泪涟涟，这几日不见张生面。红娘走上前，红娘走上前，推开帘栊望外边。‘姐姐仔细听，张生把书念。’二更鼓儿发，二更鼓儿发，一轮明月照窗纱，隔粉墙好似他说话。思想俏冤家，思想俏冤家：‘自从佛殿看见他，不由人只在心牵挂。’三更鼓儿通，三更鼓儿通，莺莺玩月到墙东，夜深沉露湿罗衣重。‘是何处叮咚？是何处叮咚？莫不是普救寺里撞金钟？莫不是铁马声相送？’四更鼓儿催，四更鼓儿催，莺莺无语自徘徊，叫一声：‘红娘小妹妹！奴家好伤悲，奴家好伤悲！几番为他泪珠暗垂，抛不下书生张君瑞！’五更鼓儿敲，五更鼓儿敲，明星照露滴花梢，树影摇错当他来到：‘提起好心焦，提起好心焦，是我前世把断头香烧，今世里于飞难得效！’”（《西厢记说唱集》，第104页）上述子弟书《西厢记》、八角鼓慢岔《小红娘》、满洲歌《西厢》，还无法证明与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不能排除来源于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可能性。因为满族的文人雅士参与到了子弟书、八角鼓的创作中，所以他们阅读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很有可能的。

再看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内蒙古图书馆藏有蒙古文《西厢记》抄本<sup>①</sup>。笔者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先生代为查找此资料。经查，该译本有三册，每册一卷，每卷四章，共十二章，是《西厢记》第一至第十二章的译本。第一册，册页式线装本，页高28.7厘米，宽23.7厘米。棉纸，楷体墨迹抄本，书名页题“Ši Šiyang Ji bicig. terigUn debter”，汉译为“《西厢记》，第一册”。次页有一译序，标题处钤有两枚四方形书印，字迹模糊，无法辨识。将蒙古文译本序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序文比较，发现两者内容一致，与满文译文的对应度比汉文高。蒙古文译本序文对原序文的一些解释性翻译，全部来自原序中的满文内容。我们把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序文录于此：

龙图既启，缥緜成千古之奇观；鸟迹初分，翰墨继百年之胜事。文称汉魏，乃渐及乎风谣；诗备晋唐，爰递通于词曲。潘江、陆海，笔有余研；宋艳、班香，事传奇态。遂以儿女之微情，写崔张之故事。或离或合，结构成左轂文章；为抑为扬，鼓吹比庙堂清奏。既出风而入雅，亦领异而标新。锦绣横陈，脍炙骚人之口；珠玑错落，流连学士之里。而传刻之文，只从汉本；讴歌之子，未睹清书。谨将邺架之陈编，翻作熙朝之别本。根柢于八法六书，字工而意尽；变化乎蝌文鸟篆，词显而意扬。此曲诚可谓：银钩铁画，见龙虎于毫端；蜀纸麝煤，走鸳鸯于笔底。付之剞劂，以寿枣梨。既使三韩才子展卷情怡，亦知海内名流开函色喜云尔。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吉旦。（《满汉合璧西厢记》，第3—7页）

蒙古文序文落款更是直接说明蒙古文译本来源于满汉合璧《西厢记》，且有翻译时间和翻译地点：即“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吉旦，将满汉合璧《西厢记》译于 Da Yun Tang（达云堂）”，这说明是道光二十年（1840）的译本。

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各分册章目汉译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是一致的。参看 [表3]：

<sup>①</sup>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343页。

[表3] 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章目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

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章目 <sup>①</sup>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
第一册 第一章yubai-dur kókeregsen terigün bülüg (惊艳) 第二章bayuqu ger-i egeregsen ded bülüg (借厢) 第三章ayalyu-dur neilegüligsen yubaduyar bülüg (酬韵) 第四章buyan üiledkü-yi samürayuluysan dörbedüger bülüg (闹斋)	卷一 惊艳 第一章 借厢 第二章 酬韵 第三章 闹斋 第四章
第二册 第五章süm-e-yi soçiyaysan tabuduyar bülüg (惊寺) 第六章qurimlan jalaysan jiryuduyar bülüg (请宴) 第七章qolbuγ-a-yi niçuyuluysan doluduyar bülüg (赖婚) 第八章kin-iyer ödegegsen nayimaduyar bülüg (琴心)	卷二 惊寺 第五章 请宴 第六章 赖婚 第七章 琴心 第八章
第三册 第九章urida boljiysan yisüdüger bülüg (前候) 第十章jakidal-i tüibegegsen arbaduyar bülüg (闹简) 第十一章jakidal-un biçig-yi burçiyysan arban nigedüger bülüg (赖简) 第十二章qojim boljuysan arban hoyaduyar bülüg (后候)	卷三 前候 第九章 闹简 第十章 赖简 第十一章 后候 第十二章

上述材料说明，道光二十年译者将满汉合璧《西厢记》译为蒙古文，可见这个时期满汉合璧《西厢记》还在蒙古地区传播。

最后看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达斡尔族《莺莺传》的作者敖拉·昌兴，嘉庆十四年（1809）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光绪十一年（1885）去世。敖拉·昌兴的诗歌书面文本有手抄本流传。其中《莺莺传》存于敖拉·昌兴后裔德善（1900—1981）的手抄本中。乌钦说唱《莺莺传》属于韵文，其首要特征就是押韵。《莺莺传》总计十六章，每章题目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章目基本一致<sup>②</sup>。

[表4]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与敖拉·昌兴《莺莺传》章目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	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章目
卷一 惊艳 第一章 借厢 第二章 酬韵 第三章 闹斋 第四章	一、Eurkeesen usuwu (开篇之言) 二、Saowu geri eirsen (找到住房) 三、Kejinnei aluur ginxisen (越墙吟诗) 四、Usun sumusuini hanjibe (痛悼亡灵)

① 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卷章题目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先生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② 吴刚主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卷》，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30页。本文所引达斡尔族《莺莺传》汉译文及其注音、对译，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本文达斡尔族《莺莺传》汉译文由笔者翻译。

续表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	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章目
卷二 惊寺 第五章 请宴 第六章 赖婚 第七章 琴心 第八章	五、Sum kurqin ailagaasen (寺庙受惊) 六、Sarilj saojoošen (宴席同坐) 七、Ukusen usuwe horqisen (反悔其言) 八、Qin tarkej tatelaasen (弹琴演奏)
卷三 前候 第九章 闹简 第十章 赖简 第十一章 后候 第十二章	九、Jixie bitegei walsen (传送书信) 十、Jiexie aqirsend aordelsen (拿信发怒) 十一、Ing-ing xiar hurqasen (莺莺翻脸) 十二、Dagij bas booljoosen (再次约会)
卷四 酬简 第十三章 拷艳 第十四章 哭宴 第十五章 惊梦 第十六章	十三、Bitgei booljood haroolsen (书信约会) 十四、Serunkiiyu xibhaasen (拷问丫鬟) 十五、Eurkewu sarind wailsen (宴会泣别) 十六、Sunei jeuded qoqisen (夜梦惊醒)

由上可见，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紧密。我们再以满汉合璧《西厢记》第二章《借厢》、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第二章《找到住房》为例，比较两者的关系。这一章主要反映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在第一章：“（张生见莺莺红娘科）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元和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而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是在第二章《找到住房》中：

Beelqee xiusai ujiseneese  
 傻乎乎的 秀才 看到后  
 Boroot bas memerj  
 很 又 执着  
 Isen sumsuni derdej  
 九个 灵魂 飞  
 Ing-ingd hodirsən  
 莺莺 向 归于

Eneiyu emeg awuosoo  
 她这个 妻子 娶  
 Ene jalendee kursen elj  
 这 辈子 够 想  
 Xareiyuu niaarewu turwund  
 脸 留恋 缘故  
 Ximnej iqiwooq heesen  
 考去 不去了

这两节韵文，两行一韵，四行一节，以上八句头韵押的是“B”“I”“E”“X”韵；这两节韵文每节的

最后一行押尾韵“en”韵。汉文意译为：“傻秀才看到，两眼直发蒙。九个魂灵飞，归于莺莺处。娶上这妻子，享福一辈子。留恋这美色，不想去赶考。”在满汉合璧《西厢记》第二章《借厢》中，张生上，云：“自夜来见了那小姐，着小生一夜无眠。今日再到寺中访那长老，小生别有话说。”“（聪云）先生来了，小僧不解先生话哩。你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因为有此事，怎么去相识？准备好礼物，让随从送去。来求老和尚，到寺院里找。借口来读书，搬进西边房。”其中“借口来读书，搬进西边房”，语言比较俭省。满汉合璧《西厢记》比较细致，有张生与方丈的对话旁白，有曲文：“不要香积厨，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轩，不要东墙，只近西厢。靠主廊，过耳房，方才停当。快休提長老方丈。”张生遇到红娘，有一番描写。满汉合璧《西厢记》：“（张生云）好个女子也呵！”“（本云）先生少坐，待老僧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来。（张生云）生便同行何如。（本云）使得。（张生云）着小娘子先行，我靠后些。”张生在红娘面前百般讨好。张生还有更积极的举动：“（张生先出云）那小娘子一定出来也，我只在这里等候他者。”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这样描写：“刚刚搬进去，正好红娘来。要把夫人话，告诉法本来。秀才意外见，非常之高兴。小姐之丫鬟，坚持耽搁久。为了能言谈，知道真想法，所做和所行，说出让知晓。”面对张生自我介绍，红娘义正辞严，满汉合璧《西厢记》：“（红云）谁问你来，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生年月日何用。（张生云）再问红娘，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出来便怎么。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奉呼唤，不敢辄入中堂。先生绝无瓜葛，何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宽恕，若夫人知道，岂便干休。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红娘下）”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这样描写：“姑娘很高傲，一直在拒绝，态度特坚定，纠缠真费劲。”不过，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最后还是比较温和：“Tob sere aaxitei serunkui, Tert iosei gianj, Hesei tani guuruujii, Unqirji gaqikaa duatsen。（丫鬟特聪明，礼貌讲事理，透彻明旨意，孤单留一人。）”

敖拉·昌兴是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的人。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文化关系紧密，达斡尔族接受满文具有时代条件。学习满文、使用满文是达斡尔人的文化常态。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等地设官学，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幼童开始学习满文<sup>①</sup>。至清朝晚期，黑龙江等地区的达斡尔人还“皆以清文”为交际工具<sup>②</sup>。在达斡尔族民间，则兴起“唱书”活动，用达斡尔语口译小说。口译时，要以一定的调式咏唱出来。这些满译文学名著，常常是达斡尔族口译者的说唱材料。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源于满汉合璧《西厢记》，与金批《西厢》关系密切。

## 结 语

清代金批《西厢》的禁毁与传播，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更能看出清代金批《西厢》的面貌。

通过上文论述可见，清代金批《西厢》的禁毁是局部的，并不具有广泛性，也并没有影响金批《西厢》刊刻。即便是禁毁满译《西厢记》，也并没有禁止住满族人民对金批《西厢》的接受。满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子弟书、八角鼓《西厢记》，间接地说明了金批《西厢》的传播力。

清代禁毁满译《西厢记》不仅没有限制住满汉合璧《西厢记》的传播，反而在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当中广泛传播开来。满汉合璧《西厢记》是金批《西厢》的译本，且是满汉合璧形式，因此可以说给金批《西厢》的传播带来了方便，让通晓汉文、满文的少数民族人士更易于接受金批《西厢》。满族、达斡尔族出现的子弟书、八角鼓、乌钦等民间说唱《西厢记》，说明这些民族更易于接受金批

<sup>①</sup>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学校志四》，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册，第961页。

<sup>②</sup> 史禄国著，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西厢》。因此也可以说，金批《西厢》在汉、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民间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为何在清代禁毁满译《西厢记》和江浙一带禁毁金批《西厢》的情况下，金批《西厢》依然盛行，并且成为压倒毛西河本等其余版本的原因。

[作者简介] 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长坂坡赵云救主”中的赵云形象在达斡尔族、锡伯族说唱中的变化——兼论人物形象民族化》等。

(责任编辑 石 雷)

· 学术信息 ·

## “经典化与再阐释：近代文学的历史定位 与价值重估青年学者工作坊”召开

2022年11月12—13日，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经典化与再阐释：近代文学的历史定位与价值重估青年学者工作坊”以线上形式召开。共有二十八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是“西风东渐与文体正变”。陈斐（中国艺术研究院）指出蒋伯潜《文体论纂要》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吸纳新知，构建本土化的文体论。狄霞晨（上海社会科学院）认为《国粹学报》将魏晋六朝文学确立为形式美与感情美相互依存的中国文学典范。常方舟（上海社会科学院）认为章士钊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汲取了墨学和《论衡》等传统思想资源。朱家英（山东大学）指出唐文治的文章理论与哲学观念、淑世情怀紧密联系，又担负文道传薪的使命。郑学（河南大学）讨论了近代“南、北文学”对举的理论现象。

二是“诗体转型与桐城文章”。李思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许承尧诗人群体代表的遗民诗人心态与创作。陈昌强（苏州大学）就林寿图诗人群体分析福建地域诗学的特点。汪孔丰（安庆师范大学）、张知强（山东大学）分别从“雅俗”理论和诗文删改的角度，探讨桐城派文学传统。

三是“史料考论与经典再释”。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将北京城视为一种深刻的生命隐喻。朱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揭示了《清儒学案》的编纂过程与学术史背景。李向阳（河南大学）以林译本为参照，分析“鲁滨孙三部曲”中的殖民者形象。周游（江南大学）对比《古文辞类纂》前后各版本的圈点，发现姚鼐古文趣味在中晚年出现变化。

四是“理论探讨与思路方法”。陆胤（北京大学）提出“生活史”这一近代文学研究视角。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晚清民国的古埃及金石题咏，反映了该时期全球的知识流动。武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探究蒙古旗籍曲家德成的生平与作品。马勤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一战”期间世界性的纸荒危机与民国通俗文学的关系。

(河南大学文学院 郑 学)